

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文/宇文所安 译/卞东波

艾朗诺否定了将词作为李清照生平的直接证据之后，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李清照现存其他体裁的作品上。也许——只是也许——李清照在词中真正想追求的是一种女性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带着她的“累赘”，让词成为她的传记。

李 清照留存后世的作品相当有限，可供研究的资料也颇为匮乏。艾朗诺研究李清照的新书《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可谓迄今为止关于这位中国古代最著名女作家的最好研究，也可能是我目力所及最好的研究。

这部专门研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本人作品及其他相关史料细致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些作品可被视为可靠的传记资料。正如本书书名的前半部分所告诉我们的，艾朗诺坚持将李清照及其作品不但置于女性创作，而且是才女创作的语境之中；他细致地将李清照性别之“累”的性质加以历史化，因为这种性别之累从李清照生活的时代到现在为止，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艾著筛选了大量无关痛痒的二手研究，这些研究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更像圣徒传记(hagiographical)。就艾著而言，尽管细节上有时让人觉得纷繁复杂，但我们看到，性别一直是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甚至，作者还试图将性别如何成为李清照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与如何成为900年以来主要是李清照的男性崇拜者与评论者的问题，加以区隔。

艾著面临的悖论早已有之。我们最初对李清照感兴趣，就因为她是一位天才词人，但她的词作提供的关于她本人的信息很少，或者说并没有直接的信息。艾朗诺第一次点醒我们，就其生平而言，李清照的词作其实真实的可能性很小，而数世纪以来，她的词集也随着她的声誉渐隆而不断膨胀。换言之，通常被用作证明“实人”之“证据”的作品，可能实际上是某种形象的建构，而这些作品就是被用作建构这些形象的文献基础。然后，艾朗诺仔细分析和历史化了将李清照词视为她情感与经验直接表达的解读传统，他也聪明地观察到，这种解读方式如何成为她作为女性作家的角色功能之一，甚至超过了男性词人。在此语境之下，中文学界极其乏善可陈的李清照研究无意中提供了不少可笑的时机。正如艾朗诺所展示的，很多学者构造不同的脚本去想象李清照如何与

她的丈夫赵明诚离别，就是为了找到一个间隙，使得她写的“怀人”词能够具有一个被创作出来的机缘。中国学者投入巨大的学力和心思为李词系年，并对她的词进行传记式的语境化，而没有想过她的词是否真的可以直接表现她的生活经历——词与中国古典诗歌是不同的，就词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艾朗诺否定了将词作为李清照生平的直接证据之后，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李清照现存其他体裁的作品上，而这些作品可以提供李氏生平更真实的史料依据。关于这一点，他非常得心应手，他在书中揭示了李清照是如何操控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s)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复杂的个人与政治情境中（她的词就是在这种情境中被阅读和评判的），完全掌控自我表现的女词人形象取代了被情感左右的女性词人形象。我们看到易安生平中两件重要的事，即改嫁与离婚，被置于她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对寡妇不同态度的双重语境中予以观照。使用材料去证明已有的结论，并不能表现中国学术最优秀的一面。

艾朗诺观察到的中文学界的问题有时颇令人抓狂，尽管他对此表现出最大的了解之同情。中国学者似乎不能接受，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妻子可以对丈夫爱恨交织，以及在任何妻子对婚姻生活的记录中，这种怨恨可以超越或混杂着爱的表达。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实为文学史上第一个由妻子全面记述婚姻生活的作品，该文也是她为赵明诚所收集到的金石拓片成书所作的序。作为一篇序，它超越了“序”这种文类的所有标准。然而，对中国学者而言，如果李清照表达任何哀怨，那么一定与她的丈夫赵明诚纳妾有关（在《金石录后序》中，某些情境中她明显有怨忿之情，但与赵明诚是否纳妾无关）。现在并没有实质性资料能够证明或否定赵明诚纳妾的可能性，但这一点无疑成为了无数学术聚讼的理由。

不 过，尽管艾朗诺批评中国学者将李清照的词作为其生平资料的观点，但这部厚达400页（按：英文版）的书实际上是从倒数60页才开始讨论李词的。讨论李清照词的部分有两章，其中一章有一半篇幅讨论的是这些词的可信度的问题。艾朗诺竭其所能将这些词重新与其历史上的某个作者联系起来，这些人都是经过他精心考证的。他努力展现李清照的词何以不同于她前代或同时代词人的作品，尽管有些地方解读得非常精妙，但我们总感觉并不是太能站住脚，这也是最后几章稍逊于书中其他部分的所在。

有人颇认为，李清照作为作家被铭记，主要是因为她所撰写的《金石录后序》。尽管艾朗诺对《词论》进行了精彩而原创性的解读，但这篇简短的词学文献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我们知道李清照主要是因为她的词人之名，因此，当我们发现我们确信知晓这位词人历史上的一切时，我们却无法将其生平与她的词联系起来。

从宋代至今，中国主流的解释传统一直将每一个文本纳入到知人论世的机制之中，进而导致了传记式解读的发展，并在王朝历史的兴衰起伏中探索文本的背景。俗语称这种方法是所谓“文史不分家”。以此来对照李清照论词的名言“词别是一家”并不完全合适，这个短语自身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将其翻译为“song lyric is a different family”，而艾朗诺的翻译更地道——“this form of writing is a field unto itself。”我们至少要抱有这种可能性，即李清照希望词属于另一个世界，它可以抵制常见于经典文体中的历史化倾向。尽管苏轼将个人生平投射到词体之中，正如他执着于在文学中记录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还有另一群词人——如晏几道、贺铸或周邦彦——总体上在词中隐匿了他们生平中的行迹，而且他们的传记也极为模糊。后世的学者与读者基于主流的历史化的解读方法，也希

望从他们的文本中重新发现什么，但这不过是捕风捉影。

艾朗诺在书中呈现了一种与中国学者不同的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并将此发挥到极致，他对我们所知和未知的都持一种严谨的诚实态度。不过，我们一旦步入词学研究领域，就像进入了一间用纸牌搭起屋子，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不足为据的论断之上，而依附于这些论断的一切都摇摇欲坠，建立在此之上的一切也不堪一击。李清照《词论》撰于何时？艾朗诺依从李清照研究者的意见，认为《词论》写于周邦彦成名的徽宗朝之前，因为李氏在《词论》中没有提到周邦彦。然而，如果我们再转到周邦彦的研究史，那么我们不得不挑战孙虹对传统周邦彦研究的批评，孙氏全然否定了传统研究认为周邦彦在徽宗朝享有高位的说法（参见孙虹《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所谓周邦彦在徽宗朝提举大晟乐府，不过是后世崇拜者的事后“追赠”而已，因为他们觉得周邦彦“应该”获此殊遇。也许孙虹是错的，但很显然，传记材料并不可靠。这就像纸牌搭起的屋子：关于某位著名但事迹模糊的人物却有推测性的历史精准度，这又导致了另一种推测性的精准度，即李清照《词论》的系年。

我 在书评的开始，暗示艾朗诺关于李清照的这部新著可能成为李清照研究的“绝世之作”(last word)。这要求书评者不但要有揄扬，也要反思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深入。艾朗诺的新著达到了某种历史考证的极限。他给我们梳理了如何能从可靠的历史资料中得到所能知的一切，而且在最后几章探究了这位历史上女词人的蛛丝马迹以及她词作中表现出的不拘一格的艺术性。我想我也能找到这些事迹，有的就在艾朗诺同样注意到的词中，有的则在其他的词中。但我也被这种动机弄得有点困惑，这实质上与中国论者深挖历史背景的做法相同，只不过更具反思性而已。也许——只是也许——李清照在词中真正想追

求的是一种女性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带着她的“累赘”，让词成为她的传记。也许她想在这个话语世界中“游戏”一下，就像男性在词的世界中“男子作闺音”。那种追求本身也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事迹”，但这个人物似乎属于另类的“词家”，在其中，她的性别没有她的技巧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艾朗诺是在其他词人创作的脉络中解读李清照词的，但他选择的参照对象足以显示她作为女性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仅从她表扬的有限的“词家”中阅读她的词，并不是要立异，而可能这种方式更好。更广阔的词的世界并没有给她（她在《词论》中所论列词家的）这样一种地位：她一直是一位“女”词人。甚至，词选家曾慥将她置于《乐府雅词》卷下有名“作者”的最末一位。他还很自负地指出，他没有排斥女性词人。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曾慥，他为世人保存了最可信的李清照的词。

（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74卷第2期，2014年12月。作者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译者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南宋黑漆葵口盘
(局部) (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